



十三年大脉络

变化

© imaginechina提供

1990年—2002年中国实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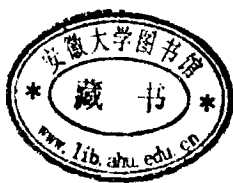
凌志军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变化

1990年—2002年中国实录

凌志军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变化:1990年—2002年中国实录/凌志军著.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1
ISBN 7-5004-3689-0

I.变… II.凌… III.社会主义建设—成就—中
国—1990—2002 IV.D61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2)第105043号

责任编辑 周兴泉
责任校对 林福国
封面设计 雪地
技术编辑 郑以京

出版发行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158号	邮 编	100720
电 话	010—84029453	传 真	010—64030272
网 址	http://www.csspw.com.cn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忠信诚胶印厂		
版 次	2003年1月第1版	印 次	2003年1月第1次印刷
开 本	880×1230毫米 1/32		
印 张	15.75	插 页	2
字 数	393千字		
定 价	25.00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前 言

本书的酝酿和写作历时三年，增删五稿，成了现在这个样子。所涉资料主要来自我对当事人的采访，以及公开的出版物，也有一些是我亲身经历的，内容浩繁，巨细混杂，困难在于比较、鉴别以及取舍。这需要时间，也需要一些基本的价值判断。

一个国家，有时候会在惊心动魄的浪潮卷过之后，却好像什么也没有改变；有时候又会在不知不觉之中走出很长一段路程。我回想1990年至2002年的中国，总觉得有点像后一种情况，用长距离大范围的眼光来观察，其格外引人入胜的地方，不是在于她的轰轰烈烈，而是在于她的平淡从容；不是在于她的崇尚伟大精神，而是在于她开始关注普通人的需要；不是在于她的伟人风范和英雄辈出，而是在于一代新人已经长大，他们完全没有经历这个国家的过去，眼睛里面只有未来。对变革的期待取代了对历史的崇拜，进而成为我们国家的主流。

但是这本书仍然只是这段历史的一部分正面和侧面，不是全部，其中不免牵涉很多重要人物和事件，也用大量篇幅去叙述那些看来无关宏旨的小人物和小事情，对于另外一些大事件，比如申奥成功、中美飞机相撞、禁止法轮功、揭露远华案、三峡水利工程建设、中国足球冲出亚洲，等等，却又几笔略过。其增删繁简的主要依据，并非出自史家标准，甚至也不是时事政治的尺

度，而是作为一个记者的眼光。书中所叙仍以指出中国的弱点为多，这也不是否认我们国家的进步，而恰恰想要更好地进步。在我看来，有时候轰轰烈烈的事情并不一定能够久远，而细枝末节却有可能长成参天大树。其沉浮逆转，书中已经述及。

中国是一个是非太多的国家，90年代给予我的一个教益，是不再拘泥于意识形态的是非。人的一生，有些事情是永远不能妥协的，比如信念，但是这并不妨碍我们接纳那些和自己不同的人。人各有志，也都拥有选择自己生活方式和表达自己思想的权利。另外一方面，自己不赞成的东西，未必没有存在的根据。我在写作这本书的时候，当然怀着纯粹属于自己的价值判断，但是我特别希望摒弃情感上的偏见，客观平和地对待那些我喜欢的和不喜欢的东西，又希望以海纳百川的精神，增进各种思想的沟通，化解成见，相互补充。我的一个同事，也觉得“是非过于分明，有时候未必是件好事”。她的年龄较我几乎小了一辈，天资聪慧，拥有自己的爱憎好恶，却又与世无争，其处世平和，同龄少有，她有一次以林语堂为例提醒我：“不要因为思想犀利，忽视了从容的魅力。”

检讨过去几年里我写的东西，最大的问题也许就是过于“犀利”，所以每次都会引起争端，以至书评的篇幅远远超过书的本身。有人说很好，有人说很坏，对于所有这些褒贬，我都心存感激。2002年春天出版的一本书，还把马立诚和我在四年前合写的《交锋》说成是“资产阶级自由化向我们党发起的新一轮交锋”。此书由人民出版社出版、梁柱先生主编，里面专辟一章批评《交锋》，计有四十二页，又牵连到我写的另外几本书。无论那些话说得有没有道理，我都觉得欣慰。对于我的赞扬与批判都能连篇发表未遭阻碍，而我依然拥有思考、写作和发表的权利，这本身也能证明我们国家已有长足的进步。

可是很多事情不能简单地以好与坏而论，实际上不论多么高

明的作者，都不能摆脱种种主观和客观的局限，我本人接触过一些达官贵人，更多的时候是生活在寻常百姓中间，较多普通人的情感，以一己之眼光、见识与胸怀去观察大世界，常有力不从心的感觉，又不肯改变初衷，所以除了再接再厉，别无他途。如果有什么地方做得不好，致使他人不快，那只是因为我的修炼不够，而非本意。

我总有一个心愿：让新闻成为历史，又能让历史像散文一样美丽，让政论像小说一样动人。首先要明白的是，对历史的理解，不是在书斋里可以读到的，也不是仅凭个人天赋就能产生，而是要在积年累月的历练中，见到不同的人，看到不同的生活，听到不同的声音，自己又有过最糟的和最好的境遇，对比起伏跌宕，品味其中酸甜苦辣，才能领悟。

我本人自幼崇尚技术，轻视文史，家境算是好的，又不属于特权阶层。如果一切按照事物本来面目发展，自然一帆风顺，也就不会有后来那么多的政治是非。可惜“文革”这样的社会变化任何人都不能躲避，我自此中断学业，少年离家，先在农村做一电工，后来参军，白天练习射击刺杀投掷手榴弹，腰酸腿疼胳膊红肿，晚上却又不肯早睡，蒙在被子里打开手电筒学习数理化以及英文，不幸被连队首长发现，批评我不安心保卫祖国，还想到外国去，于是悬崖勒马，把全副身心投入军事。有一天首长忽然告诉我不要再埋头训练，改行写新闻。我知道那并不是因为我有文才，而是因为他们发现我的父亲在报社工作。父亲的确是做新闻的。他出身于旧式农家，却又向往新生活。十七岁离家出走，以文为生，十八岁投奔共产党，一生本分，听党指挥，而将个性收敛，把思想压在内心深处。我在童年时总能听到他的朗朗笑声。他喜欢在周末和我下围棋，一边落子一边给我讲“霸王别姬”的故事，还说那是他最快乐的时光。但是后来他的笑声渐渐少了，终日沉默寡言，总把双眉紧锁，身体越发消瘦，体重不到

· 变 化 ·

九十斤。人家都说“人到中年瘦是福”，但我知道他的变化与“福”无关。有一次我想让他开心，把围棋捧到他面前，心里期望再次听到他的笑声，他却推开棋枰，淡淡地说他不喜欢下棋了。1978年夏天，我被调回北京，到新华通讯社做记者，在离开父亲十年之后终于回到他的身边。那个早晨我冲进家门，告诉他“子承父业”的消息，以为他也会高兴，不料他仍然没有笑容，仍然沉默。1985年他六十二岁，身患肝癌，病入膏肓之际用枯槁如柴的右手拉住我的衣角，好不容易开了口：“做……正直……诚实的记者，很难……很难。你能……能吗？”那一瞬间，他深陷的眼睛里有一滴泪，既纯净又混沌。这是我惟一一次看到他在哭。我来不及细想他的话，只盼他的眼泪能流下来，因为怕他把泪水带进坟墓。可当时他躺在病榻之上，仰面向天，所以眼泪并未夺眶而出。他就这么走了。我去八宝山公墓为他送行，看着他的躯体和眼泪在火焰中化作一缕青烟，然后又到他的办公室去收拾遗物，有些文件，有些信函，有些书籍，有些会议记录，最厚重的一叠稿纸居然都是他的检讨，其中一份的题目是《我反对毛泽东思想的罪行》。那是他在十八年前写的，竟还留着。我在他的桌前坐下，只看了第一行，已是泣不成声。

因为有了这些经历，不免品格复杂，越是思念父亲就越是不愿像他那样无奈地生活，头脑中形成“否定一切”的习惯，崇尚精神的独立与自由，不能与流行的政治思想雷同，又不肯按照多数人的标准攀登成功之梯。于是退居斗室，终日写作，孤灯寂影，心底风起云涌，耳边澎湃有声，都只能对无形的听者诉说。经过无数悲伤与欢乐，重温父亲一生，逐渐明白做人须比做事付出更多，生命的质量比生活的质量更值得求索。此后几年稍有成果，又去感受被赞扬和被批判、被追捧和被冷落、被热烈包围和被寂寞笼罩，在这两极世界中不停地冲撞，这才越来越把胸怀敞开。内心拥有了自己也拥有了整个世界，方知个人渺小，生命的

独立与自由，要在大历史中获得。

二十五年前开始记者生涯的第一天，阎吾先生对我说：“新闻是瞬间的历史。”他是我们国家最著名的军事记者、我的上级，也是我的前辈。他们那一代人，是以这样的信念投身于自己职业的。我现在所做的工作，只是在秉承这一传统，把无数瞬间连缀起来，加入个人判断。不敢期望这将成为历史，能够让读者喜欢，已是很奢侈的愿望。

就我本人来说，还有一个多年来挥之不去的私念，就是能够对得起父亲遗愿，所以我将本书献给我的父亲。如果他还活着，该是八十岁了。

作者

2002年12月15日于上海

目 录

前言..... (1)

第一部 谷底(1990—1991)

第一章 活着的祖宗..... (3)

第二章 大灾年..... (36)

第三章 死灰复燃..... (64)

第二部 风云际会(1992—1994)

第四章 转折..... (97)

第五章 盛世无英雄..... (135)

第六章 新人治国..... (181)

第三部 潜流激荡(1995—1998)

第七章 软着陆..... (219)

第八章 伟人逝去的日子..... (263)

第九章 朱镕基与民心向背..... (30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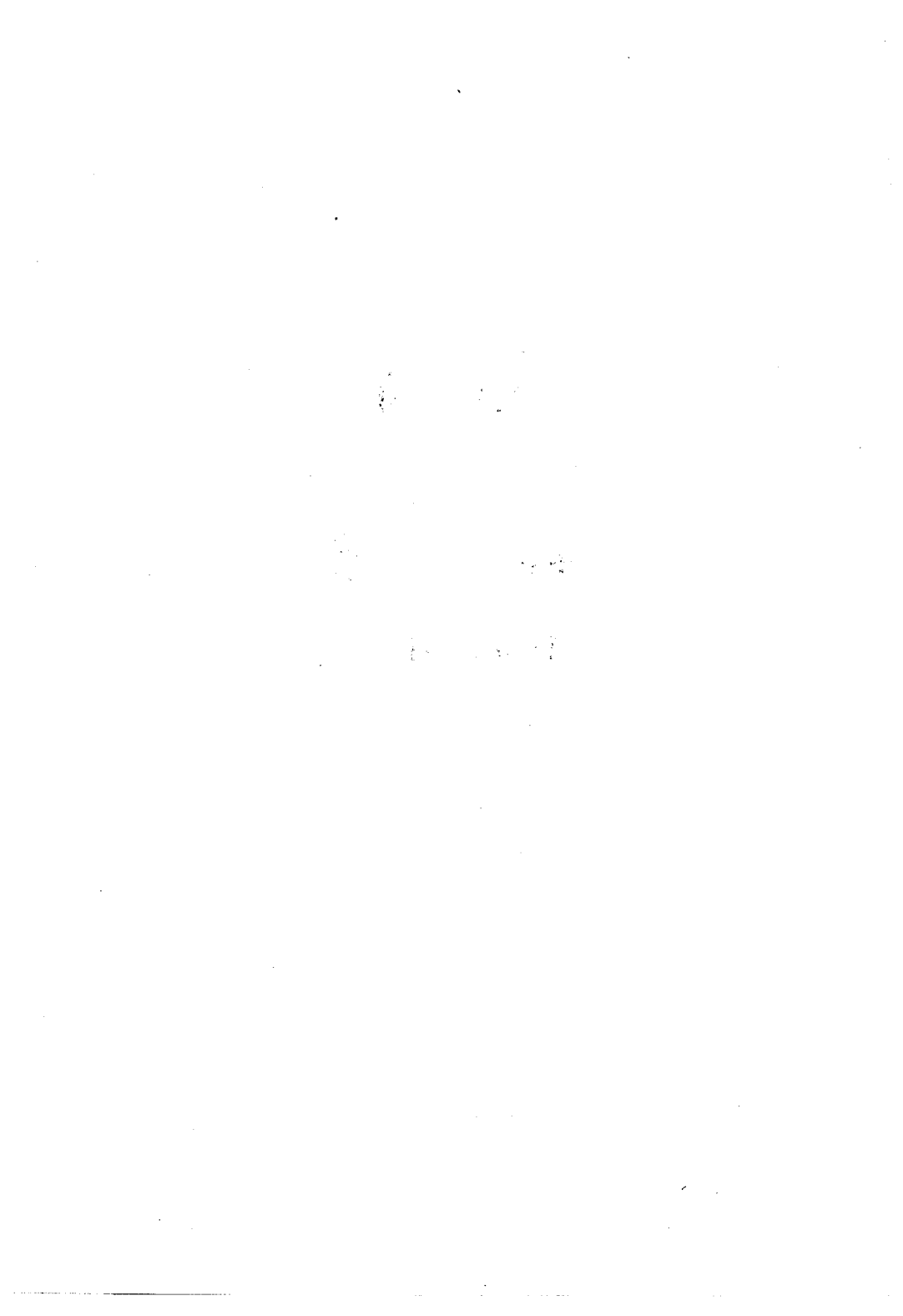
第四部 新的梦想在召唤(1999—2002)

第十章 殊途同归	(339)
第十一章 忏悔的年代	(395)
第十二章 新人类,新生活	(434)
尾声 后继者	(484)

第一部

谷 底

(1990—1991)



第一章 活着的祖宗

1990年那个春天，整个中国似乎深陷因果轮回之苦。

在帕米尔高原和长白山之间，火焰绵延不绝，长达四千八百公里，覆盖着西北、华北和东北的大片国土。一位学者把这“条带状的火线”叫做“地火”，说它已经燃烧几百年，每天烧掉至少五十万吨煤。不过，没有死人，伤者也很少，这是北方人的幸运。可惜这条“地火”之外，火灾也是层出不穷，平均每天一百五十六起，烧死七个人，还烧掉八十万元人民币。新年第一个月，北京接到五万件告状信；上海有数千吃了不洁毛蚶感染甲肝的人，尽管大都痊愈，却还抱怨不已；广州有几个大公司的经理逃到国外去了；云南发现一百四十六个艾滋病病毒感染者。还有刑事犯罪、环境污染、老少两代之间的隔阂、怠工的、吸毒的、嫖娼的、冷嘲热讽政府的。诸如此类的消息，在当日媒体上是没的，所以老百姓很难知道。普通人身边的气氛倒是和和平平的。10日，在北京城内实行了七个多月的戒严被取消。东长安街上的国贸中心大厦即将竣工，去年夏季被打烂的那些外紫内白的玻璃幕墙，也已恢复原样。这时候已是旧历腊月，“祥和”成了北京人的口头语。春节终于来到，成千上万个家庭团聚在一起，其乐融融，不过，因为那一场风波，也有不少家庭是不祥和的。春节之后的几个星期里，坏消息接踵而至。外经贸部的官员

一个劲地抱怨出口下降。农业部长何康说，夏季粮食减产，形势严峻。统计局的公报说，工业生产下滑了，全中国的经济都在“疲软”。但是最要命的是人心离散。一个退休的军官指着刊登那个消息的报纸说：“疲软？什么疲软？就是完蛋。”中共中央颁布了一个决定，宣布要“多一点计划”，还要“加强集中”，这无论站在哪个角度说，都是有些道理的，可是哈尔滨市政府有个心直口快的干部就不以为然。“计划？”他站在自家的硬杂木拼花地板上，对一位来自北京的记者抱怨道：“我们不会‘计划’别的，‘计划’浪费在行。‘大跃进’进去几百亿，‘文革’进去几百亿，‘华国锋时代’进去几百亿元。这些钱啥也不用干，光吃，也够中国人吃两辈子了！”他的语气夸张，数字也不准确，但不满的情绪却是真实的：“他妈的，我‘搞计划’三十多年了，这些事情我都干过，我比谁都知道。”

经过1989年那场殊死搏斗，中国人好像在一夜之间就分裂了，不过，无论是那些喜欢80年代还是不喜欢80年代的人，现在都希望有一点时间喘口气，可是西方人却在一夜之间变得空前团结，至少有二十个国家的政府联合起来，拒绝邀请中国高级领导人到他们的国家去，还阻止他们的商人和中国打交道，说是“经济制裁”，让中国人喘息不得。钱其琛^①后来拿一句诗来形容这时的形势，说是“黑云压城城欲摧”。

然而还有更大的一片“黑云”：社会主义的大家庭分崩离析了。在90年代开始前后的那几个星期里，从东欧那边传过来的每一个消息，都让中国人既震惊而又嗟叹不已，直把一颗心提到嗓子眼上，怎么也放不下来。

第一个消息来自新华社驻东德的一个记者。他的报道说，东

^① 钱其琛当时是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

德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把自己的总书记昂纳克开除了。一个小时以后，又有消息说，那不是昂纳克，只是他的一个助手。新华社于是赶忙收回那条新闻，《人民日报》则因为自己没有理睬新华社的消息而好一阵庆幸。可是，新的消息又来了，说昂纳克的党籍被开除了，这回是真的。还有，捷克斯洛伐克成立了战后三十五年以来第一个共产党占少数的政府。这个国家群雄并起，各方政治派别达成协议：总统应是不属于任何党派的捷克斯洛伐克人。在中国共产党人看来，这等于是把共产党的领导权给剥夺了。更要命的是，那里的老百姓居然接受这种资本主义复辟式的结果，因为已有消息证实，布拉格的居民正在街上游行庆祝，有如1968年的“布拉格之春”。书店老板看了这情景，当场把不同政见者的那些著作拿出来，很快被抢购一空。这一边，保加利亚共产党也把自己的领袖日夫科夫开除出党。春天开始的时候，共产党在东欧的处境就更糟了，有点像过去很多年里被他们宣布为“反动政党”并加以取缔的那些组织了。4月17日，布拉格市检察长索科尔以一个执法者的身份，要求两周之内在布拉格取缔共产党的活动。布拉格市民只等了五天就不耐烦了，大约七千人聚集在市中心的瓦茨拉夫广场，冒雨高呼口号，发表演讲，全都是支持检察长的。游行队伍的标语有一幅最为醒目：“支持索科尔，取缔共产党。”东德倒是没有这样的集会，也没有这样的标语。可是有至少一百万苏联和东欧的移民越过倒塌的“柏林墙”跑到西德去了。那道墙是六个月前被拆除的，再过六个月，也即1990年10月3日，分裂了四十五年的德国统一了。统一之前的这几个月里，苏联军队还在这里驻扎着，不过已经不再拥有往日的风光。在柏林勃兰登堡附近出售旅游纪念品的小摊上，你可以看到他们的军帽、肩章、奖章和零七八碎的苏军物资，其中有苏联海军军帽，二十马克，还有苏联空军军帽，二十五马克。

苏联人那时候还在观望，莫斯科还没有发生“八·一九”事

件。即使是那些最有先见之明的人物，也认为那个堡垒虽然已经摇晃起来，可还能挺不少日子。布鲁金斯学会的爱德华·A·休伊特那时候是这样谈论苏联的：“他们正在写《如何改革社会主义》这个剧本，我们还没有看到最后的篇章。”戈尔巴乔夫仍然控制着局势，他承认：“苏联现在正处在改革最困难的阶段。”但他仍在坚定地阐述党的立场：“苏联现阶段的改革是对社会主义进行革新，而不是拒绝列宁、布尔什维克和人民在1917年10月做出的选择。”他是4月10日会见参加共青团二十一次代表大会的代表时说这些话的，这给了全世界的社会主义者以极大鼓舞。至于说戈尔巴乔夫是“最大的叛徒”，那是二十个月以后的事。在当时，中国人还把他当成一股背叛潮流中的坚定革命者。一位领导人在那个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去了苏联，说“苏联现在仍然是社会主义国家”。

可是在东欧，“社会主义”在很多人的心里已经成了“痛苦和绝望”的代名词。1990年12月7日，保加利亚总检察院向最高法院提交了起诉书，指控托·日夫科夫作为保共中央第一书记、部长会议主席和国务委员会主席，超越职权，为自己和其他一些人谋取总计二千六百五十一万六千零三十九列弗的私利，包括把公款用于维修自己的别墅，给保健护士和航空小姐发奖金，从出版社获取的稿费，让子女得到不应有的服务，以及把六十九辆小汽车以低价格给了指定的人。诸如此类的事情被揭露出来，让这些社会主义的领袖们不仅在信仰方面不再具有感召的力量，而且在道德方面也威信扫地。“社会主义把一头牡马变成一头阉马”，一位波兰经济学家说，“我们还不能反过来把阉马变成牡马。”在他的国家中，一个胆大妄为的工人莱·瓦文萨组建团结工会的行动，是席卷东欧的这场大变动的起点，此人因此成为这个国家第一任民选的总统。1990年12月12日晚上，老总统雅鲁泽尔斯基向新总统交出权力的前夕，向他的国家发表“告别讲话”。“每个

民族的历史都不仅仅是既成事实的总和，它同时也包括着得以避免发生的事实。”他悲悲切切地说：“我只请求一点：如果时间没有熄灭某个人心头之恨或者不悦，那么就让它们首先向我发泄吧。”对于中国的共产党人来说，这真是个悲惨的时刻，他们全都把雅鲁泽尔斯基看做悲剧英雄而把瓦文萨看做得志小人。可是有二十四个西方国家的外交部长聚会在布鲁塞尔，决定掏出四十亿美元，支持这小人的“把阉马变成牡马”的经济改革。

毫无疑问，几年以来发生在波兰的事情，现在正在更大范围内重演。在我们的国家，报纸电台电视台全都急剧地旋转起来。奇怪的是，所有最重要的消息都是在私下传递的，公开发布的新闻则视而不见。

世上很多事情都可以装糊涂，惟有这件事不成。冷战就要结束了。当然，它也像任何一场战争一样，结束之前的冲突格外激烈和残酷。现在回想起来，那时候，有些人还真不是装糊涂，而是自作聪明。比如有几个宣传部门的官员就告诫属下报刊的总编辑，正确看待东欧社会主义大家庭中还剩下的两个领袖：一个是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此人尽管主张改革，但却是个“民主主义者”；另一个人是罗马尼亚的总统齐奥塞斯库，他是反对改革的，还在党代会的报告中处处影射攻击中国的改革，但他毕竟是“坚持社会主义”的，他讲话的时候，听众六十五次起立，向他鼓掌和欢呼。

媒体摘取了这些情节，添油加醋地传达给读者，希望所有中国人能和他们一样，相信齐奥塞斯库得到了人民的拥护，也相信社会主义制度面临的危机，完全是一小撮坏蛋捣乱的结果。可是接着就有更加令人惊讶的消息传过来，不仅证明罗马尼亚党代表大会上的那些掌声和欢呼都是虚伪的辉煌，而且还表明齐奥塞斯库的“社会主义”已经被人民摒弃。90年代开始之前的两个星